

程中原 夏杏珍 著

历史转折中的 人和事



四川人民出版社

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2016 年 10 月 21 日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政治经验、高超领导艺术，强调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2014年8月20日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陈云同志为我们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卓越贡献。1978年底，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胆识提出，要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解决好历史遗留的若干重大问题。他的发言受到与会同志积极响应，为突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11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2015 年 6 月 12 日

三十年代初，张闻天同志在走上中央领导岗位时尽管执行过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但是在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特别是在长征中，他深刻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认识到只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毅然与“左”倾错误决裂。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并受委托起草了会议决议，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伟大历史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江泽民，2008 年 8 月 30 日

目 录



毛泽东

- 长征的胜利与以毛洛合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最初格局的形成 003
- 毛泽东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012
-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贯彻实施群众路线的理论与实践 021
- 毛泽东纳谏：同意解散农村公共食堂 041
- 领导者要勇于承担责任
- 1959：毛泽东在上庐山前讲秦穆公引咎自责、重用孟明的故事 046
- 毛泽东与历史小说《李自成》 052
- 毛泽东的左眼手术与《创业》批示 059
- 敌乎？友乎？——“周扬一案”处理始末 066



邓小平

- 天降大任——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的历史机缘 077
- 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与1975年整顿 111
- 1975：邓小平主管外事 126
-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始末 140
- 关于邓小平复出后的思想发展
- 中美学者三人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高端人物之一 158
- 邓小平何时居于主导地位
- 中美学者三人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高端人物之二 170
- 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73



陈云

- 陈云的贡献和他同邓小平的配合合作
——中美学者三人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高端人物之三 189
1977-1982：陈云在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独特贡献 194
看似寻常实奇崛——谈谈陈云“多谋善断”的决策艺术 217
并肩战斗 情长谊深——陈云和张闻天交谊述略 228



张闻天

- 张闻天的人生轨迹 253
长征中的张闻天 259
西安事变中的张闻天 286
庐山风云中的张闻天 296
动乱年代里的张闻天 329
张闻天最后的脚印 355
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十大贡献 367



华国锋

- 华国锋领导粉碎“四人帮” 381
关于华国锋的评价问题 446

后记 464



毛泽东



长征的胜利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最初格局的形成

长征的胜利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最初格局的形成，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在遵义会议前，中共有过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实际当权者是李立三）、王明、博古几任总负责人，但都没有形成稳定的、能够团结全党进行胜利斗争的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开始建立，在领导长征取得胜利的过程中逐步巩固，并最终确立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的。正因为正确的领导取代了错误的领导，中央红军才能胜利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才能胜利会师，震惊世界的长征才能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长征中形成而又领导长征取得胜利的历史，包含着丰富的经验，值得研究总结。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 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建立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它的主要功绩：一是批判和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和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指明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这就首先在当时最为重要的革命战争问题上，纠正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二是变换了党中央的领导，取消原来的最高“三人团”，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洛甫（即张闻天）起草决议，常委中再作适当分工。这就在实际上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

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是在斗争中逐步形成的。遵义会议后建立的毛洛合作领导党和红军的格局，也是在从反“围剿”到西征突围一系列矛盾斗争中逐步形成的。

首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意见分歧，“博洛矛盾”不断加深，洛与毛的看法趋于接近，逐渐形成“毛洛合作”的局面。

早在1932年秋冬，张闻天就已经在文艺和宣传战线上比较自觉地开始反对“左”倾错误。1933年春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以后，洛甫和博古等一起进行了错误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但洛甫很快就同博古在政治上产生了分歧。在对联合中间势力的“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和政策上，“左”倾领导集团的两位主要人物进行了争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洛矛盾进一步发展和加深。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为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可是博古和李德采取关门主义态度，没有抓住这个重要关键。张闻天著文从反倾向斗争高度，予以批评，并主张军事上应该“积极配合”，明确反对红军西调而主张东进援助十九路军，联合起来反蒋抗日。广昌战役前，张闻天和毛泽东都反对组织这次拼消耗的战役。广昌战役失败后，张闻天在中革军委会上批评博古“不该同敌人死拼”，引起激烈争论以致不欢而散。二苏大会后，张闻天在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上同毛泽东配合合作得很好。他不仅在主编的《斗争》上首次发表毛泽东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而且学习毛泽东的方法调查研究了区乡苏维埃的工作，同毛泽东联名出版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和毛泽东同住云山古寺，两人坦诚交谈，感情融洽，思想一致。这时，张闻天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明确提出“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在署名社论中已经明确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批判执行“左”倾军事路线的机械论者的种种错误，阐明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包括转移地区）以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长征出发前，在张闻天接受毛泽东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基础之上的“毛洛合作”已经相当紧密了。

第二，在长征之初，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奠定了遵义会议胜利的基础。

毛、张、王“中央队三人团”是由毛泽东和张闻天一起对最高“三人团”要把他们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表示异议后留在总部而形成的。“博洛矛盾”和“毛洛合作”在党内高层领导中本来就已经不是秘密，“中央队三人

团”的出现，更成为张闻天和王稼祥在组织上从“左”倾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标志。毛、张、王三人一起行军、一起宿营，在这种特定条件下，毛泽东结合前后五次反“围剿”胜利和失败的实践，主动地系统阐述他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张闻天和王稼祥服膺并系统地接受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这样，毛、张、王“中央队三人团”必然地成了反对错误军事领导的决定性的主要力量，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第三，在湘江战役失败后，毛泽东、张闻天抓住最高“三人团”无法再领导下去的时机，通过争论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过了老山界以后，毛泽东、张闻天不失时机地开始了对错误军事领导的批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西征突围以来的挫折，已经证明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李德、博古的那一套是错误的；同时也已经证明，在博洛矛盾中，洛甫的主张是正确的，而博古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这样，毛、张、王三人在争论中占据了主动，而李德、博古则陷入了被动。但毛泽东、张闻天并没有把主要精力花在失败原因的讨论上，而是集中在红军的战略方向问题上，这就抓住了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最为急迫的问题，极有利于在政治局内争取多数。于是，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否定博古、李德继续进军湘西而改向贵州进军的主张得到通过。接着，周恩来又主持“黎平会议”，通过激烈争论，再次否定去湘西的方针而决定进军川黔边区，并决定到达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路线上的是非问题。会后两天，张闻天在黄平的橘林里同王稼祥谈话，提出要由毛泽东出来指挥军事。而王稼祥先前已有过把李德、博古轰下去的意见。王把张的提议首先在红军主要将领中加以传播，得到赞同。此后“猴场会议”决定强渡乌江，袭占遵义。在行军途中又实际上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至此，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实际上也已经明确了。

第四，在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多数以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中坚和核心，同“左”倾错误领导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作副报告以后，第一个站出来讲话的，是张闻天。他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旗帜鲜明而又有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突围以来军事领导的“左”倾错误。张闻天作“反报告”时拿着一份提纲，这个提纲

是毛、张、王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观点为主导的。这时由张闻天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张闻天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书记处书记（即常委），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他首先站出来作“反报告”，就为彻底否定单纯军事防御路线和“左”倾的中央领导定下了基调。毛泽东紧接着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重要发言，深刻地分析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王稼祥发言也有力地支持了张闻天和毛泽东。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以及王稼祥的发言，得到周恩来、朱德和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遵义会议的胜利是政治局和各军团领导同志团结斗争的结果，而“中央队三人团”，特别是毛泽东、张闻天的配合合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遵义会议对变换中央领导作出了决定，但由于时间仓促，新的领导集体的建立、健全还有待于会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遵义会议后一天（1月18日），政治局对常委分工首先作出一项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毛泽东重新回到军队的领导岗位。在土城战斗失利、红军一渡赤水向扎西集结途中，2月5日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替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张闻天就任后，在短短几天里，连续召开中央会议（即扎西会议），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作出中央红军回兵黔北和缩编部队的决定，对中央苏区和红二、六军团的战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向红四方面军及时电告中央红军战略方向的改变，并于2月10日召集军委纵队干部会议亲自作了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报告。在二渡赤水再占遵义后，张闻天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由此授予了毛泽东前方的指挥权。此后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发生了争论。事后，张闻天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并通过成立新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机构，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使命全部完成。此后，毛泽东逐步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的军事统帅。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中央红军取得 长征胜利中得到巩固

遵义会议后建立起来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巩固的。土城战斗失利后，博古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毛泽东坚持不能进攻打鼓新场，还被政治局会议撤了刚任命的前敌总指挥的职。毛泽东、张闻天的权威是在正确指挥军事行动，又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进行党内斗争的过程中树立起来的。他们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是在粉碎敌人围追堵截、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胜利过程中得到巩固的。

第一，“四渡赤水”的胜利和会理会议的召开，巩固了毛泽东军事领导的地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打运动战，声东击西，迂回穿插，于1月29日、2月20日前后、3月16日至17日、3月21日至22日四次渡过赤水河。接着，3月底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调出滇军后，又奔袭云南，威逼昆明。然后挥师北上，于5月3日至9日抢渡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正确和军事指挥的高明。可是，在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兜大圈子机动作战时，军中领导干部并不都理解、信服，反映意见颇多，林彪甚至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前敌指挥。在跳出包围圈后，5月12日张闻天在会理城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和动摇。通过会理会议，毛泽东用运动战摆脱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确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地位逐步巩固起来。

第二，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对张国焘的团结和斗争，巩固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地位，并为今后三大主力的会师打下了基础。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做了许多工作。除了举行会师大会，号召互相学习，要求红四方面军学习遵义会议决议等以外，决定周恩来的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担任；组织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吸收红四方面军6名干部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其中两人进政治局；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原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与原红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编入左路军，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一起随左路军行动。对于红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始终坚持北上的正确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的退却、逃跑方针。从两河口会议到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对张国焘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和思想斗争。对于张国焘攻击遵义会议为调和主义，进行军事示威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工作的无理行为，则坚决加以抵制。面对张国焘的分裂活

动，张闻天主持常委会作出决定，将统一领导的权力集中于常委会和党中央书记，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并主编《斗争》，各部有事与书记张闻天商量，张还兼管组织部，主编《干部必读》。在这之前已经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毛泽东、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对犯错误的同志采取了团结的方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对张国焘破坏团结的错误主张又坚决进行了抵制。所以，遵义会议后建立起来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警觉到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时，果断地一致作出率领右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决定，及时脱离了险境。

第三，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结束长征，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完全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领红一、三军团脱离险境后，在俄界即决定将北上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由毛、彭和周恩来、林彪、王稼祥组成“五人团”指挥军事。到达哈达铺后，及时决定把陕北作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这样，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于10月到达陕北，11月初在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形成一支可观的武装力量，并且有了一块较大的根据地，结束了一年来无后方流动作战的状况，胜利完成了长征。陕北是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打开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和指挥部。领导中央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自己的领导地位巩固地建立在这一支红军和这一块根据地之上，从而为日后战胜张国焘分裂活动，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确立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对全党全军领导地位完全确立的标志

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固然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基础，但同时应该看到，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在落脚陕北之时，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还没有能够实现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特别严重的是，张国焘不仅掌握着对红四方面军的指挥权，而且从1935年9月底起凭借通电密码和总政委头衔直接指挥着长征途中的红二、六军团；10月5日又公开打出分裂旗号，宣布另立中央，自封党中央主席，通过决

议开除毛、周、博、张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所以，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的统一领导，是经过一年多艰苦复杂的斗争，直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才真正实现的。

对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致电张国焘，严肃批评他“另立中央妨碍统一”的“政治错误”，劝诫他“自动取消”，并由林育英（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进行批评教育，还通过朱德做团结争取工作。在组织关系方面，则在坚持合法的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前提下，采取变通办法，红四方面军方面成立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与中央发生横的关系。争论的问题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与此同时，提出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最终应来陕甘，在北方建立、壮大根据地。毛泽东、张闻天与林育英商定的这一方案，立足于团结，既坚持了原则，又作出了一定的妥协，无论在共产国际面前，还是在全党全军面前，都取得了主动。而张国焘执迷不悟，继续坚持其另立的“中央”，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这就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陷入了被动和孤立。

促使矛盾发生根本变化的还是实践的检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以后，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毛泽东、张闻天密切合作，把握历史的关键，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卓有成效地及时领导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陕甘边区根据地得到扩大和巩固，红军得到发展和壮大。在这一年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做了许多大事：从瓦窑堡会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经过1936年春的晋西会议，到八九月的政治局会议，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转变为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把抗日反蒋方针转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方针，完成了从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从初到陕北时调整对富农的政策开始，调整了各种政策，团结了各种可以团结的力量；和东北军、西北军实行了联合抗日，同各地方实力派建立了程度不同的统战联系，同国民党就联合抗日条件的秘密谈判逐步进行；红军于1936年春过黄河进行了东征，胜利回师后又进行了西征，扩大巩固了根据地，发展壮大了红军，并在全国人民中传扬了红军和共产党的声威；派刘少奇到处在华北抗日斗争前线的北方局领导白区工作，建立了中央与北方、东北、华中、西南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同上海救亡团体、爱国人士和地下党的关系也恢复和建立起来；由于林育英被共产国际派回到陕北，及时了解并贯彻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恢复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支持和指导。总之，

取得巨大成绩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被共产国际认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已经被国民党南京政府确认为代表共产党的谈判对手，已经得到东北军、西北军和各地方实力派的重视，已经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这些事实说明，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其创造的业绩确立了无法动摇的领导地位。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国焘推行“南下”方针使红四方面军遭到严重损失。到1936年2月下旬，南下时的8万部队，只剩下4万人。南下失败，张国焘又变计“西进”，企图在康川青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并于5月初在甘孜建立“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致使几万红军被困在人烟稀少、粮食缺乏的西康一隅，难以生存。实践证明了党中央“南下是绝路”的预言，证明了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和逃跑方针是完全错误的。

党中央领导下发展革命新局面的胜利，张国焘分裂、逃跑的失败，是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完全确立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但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经过了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

5月20日，被张国焘切断8个多月的红二、六军团同中央的联系得到恢复。红二、六军团已北渡金沙江，将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国焘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他另立的“中央”了。在毛泽东、张闻天、林育英等通过电报反复说服教育下，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帮助、敦促下，张国焘不得不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共中央”，并勉强同意北上。但张国焘仍不愿放弃其脱离中央以自成局面的打算，到9月中旬又对北上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方针产生动摇。在朱德将张国焘不愿北上、坚持西进等情况紧急致电中央后，毛泽东、张闻天、林育英等连续致电张国焘和红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制止张国焘的动摇，力促迅速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由于党中央的耐心说服和明令禁止，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等的反对，红四方面军其他领导人的抵制和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加之在兰州以西渡黄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放弃西进的计划而继续北上。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城会师。10月22日，红二军团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23日红六军团在兴隆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举世闻名的长征以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等地的大会师而宣告胜利结束。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